

用私人记忆重现历史细节

——《中非大使系列访谈录》项目序言^①

飞 鸿*

口述史是中国史学的一大传统，而在缺乏书面文字的古非洲社会，口传史更成为传承历史的基本方式。自2010年起，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在多位中国前驻非外交官的支持下，启动了中非关系口述史影像资料建设项目，并推出“中非大使访谈录”系列专栏。目前这一工作已经取得系列成果，将在国内相关刊物推出。这里，笔者就本项目实施的构想与期待略作说明。

这些年，因从事非洲研究工作，笔者结识了许多中国和非洲的老外交官。在不同场合的交流叙谈之中，不时听他们讲起过去年代所经历之种种趣闻佚事。这些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这些只流传于坊间的“旧闻”，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呈现了过去数十年中非关系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种带有强烈个人记忆色彩的讲述，实有助于重建当代中非关系史的细节原貌，让模糊了的岁月重新变得鲜活和感人。若能以专业方式将其记载下来，它就可转化成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让当代国人的奋斗经历融汇到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传承千年的记忆长河中去。

^① 本文是作者为“中非大使访谈录”项目启动写的序言，相关文章将陆续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本项目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赵俊博士、徐薇博士负责，得到了中国多位驻非大使尤其是中国驻喀麦隆前大使许孟水先生、《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个人和机构的大力支持，在此特致谢忱。

这里略举几例。

2003年初,我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讲学。一天,我前往出席“坦中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大会主席台设在一棵参天大树下,一排排大红灯笼挂在高高的波巴树上随风摆动。身着艳丽服饰的非洲嘉宾们纷至踏来,笑声朗朗。在浓荫掩映的大树下,一支钢鼓乐队把整个会场烘托得十分热闹,演员们不时用非洲味很足的汉语演唱着《在北京的金山上》、《坦中友谊之歌》等中国六七十年代的老歌,让我在这遥远的热带非洲丛林中有一种时空倒流、恍然如梦的感觉。

会间,我见到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他曾担任过驻华大使、驻联合国大使、坦政府总理,也曾长期担任统一组织秘书长,后又担任非洲联盟特使和非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首席调解员,是当代非洲著名的政治家。那天,他兴致很高,闲谈之中他说,“知道吗,我27岁就到你们国家去当大使了。我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你们的毛主席递交的国书呢”,他说的这些事,我过去也有所耳闻,不过接下来他又说,“我当驻华大使期间,有工作要见你们周总理,经常是在晚上九十点钟”,看着我有点困惑的样子,他补充说,“因为那时你们正在闹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天天造反,周总理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见外国大使谈工作”。

接着,我向萨利姆先生问起“联合国跳舞”的佚事是否属实,他听了哈哈大笑,点头称是。许多中国人可能都知道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这当然是个形象的说法,但如把这话当真,那么这位萨利姆先生,可就是当时在联合国直接抬中国这把大轿子的非洲朋友了。1970年,萨利姆由驻华大使改任驻联合国大使,其间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努力。许多中国人也都记得一个感人的镜头,1971年底联合国26届大会宣布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一群年轻的非洲外交官马上在会场上载歌载舞,热烈庆贺,而其中一位就是萨利姆先生。联大会场这场即兴之舞,生动诠释了过去几十年中非友好关系的纯真自然的特性。但也因为这一跳,却让美国人记恨于心。10年后的1981年,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在中国支持下,推举萨利姆为新一届联合国秘书长时,美国动用了16次否决票,而中国也对美国支持的候选人“一否到底”,坚持新秘书长必须由第三世界的人担任的底线。最后,联合国以折中方式推举来自秘鲁的德奎利亚尔出任秘书长。记得那天我问萨利姆,对于当年的跳舞之举后悔吗,他大笑起来,“怎么会后悔

呢，那是最开心的记忆”。2009年，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萨利姆与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等当选“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中国的五位外国人”。在北京的颁奖大会上，萨利姆本人因事未出席，但年过八旬的卡翁达先生却远道而来出席了。

30多年前，卡翁达、尼雷尔、萨利姆一起成为中国援建坦赞国际铁路的直接推进与领导者。颁奖大会上，我作为“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之一问卡翁达先生，是否还记得1974年2月22日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形，他说记得很清楚。之所以提到这次会见，是因为毛泽东在与卡翁达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观点，并说中国与非洲同属第三世界，而卡翁达本人，后来则提出中非是“全天候朋友”的著名论断。

显然，“同属第三世界”、“全天候朋友”这些时代词语，十分精妙地概括出那个年代中非跨越大洋建立平等互助关系的真实状态。作为当事人，萨利姆、卡翁达这些非洲政治家，与新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特殊的交往，有许多宝贵的私人记忆。这些记忆的记录与保存，应该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几年，我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交往甚多。有一次，为配合国家领导人出访，我与刘贵今大使一起率一个大型的中国学者代表团赴南非和埃塞俄比亚，出席中非、中埃关系研讨会。在当代中国外交官中，刘大使是那些自我戏称“一条道走到黑”的职业外交官（按坊间戏言，外交官驻欧美国家为“白道”，驻亚洲国家为“黄道”，驻社会主义国家为“红道”，驻非洲国家为“黑道”，一生都做对非工作则为“一条道走到黑”）。这次出访路上，见了不少老友旧朋，闲聊之中讲起许多当年的往事。其中一段不经意说起的往事让我印象深刻。据刘大使说，他担任驻南非大使时，有一次去拜见曼德拉总统。这位在白人种族主义监狱中渡过27年的传奇人物，像老朋友一样招待中国大使，叙谈之中，他告诉刘大使，当年他与非国大一批政治犯被关在罗本岛上时，每逢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那天，狱友们在院子里放风，会用非洲人的握手方式，手掌相向，交叉连握三下，以示庆贺和相互勉励，“我们把你们的节日当做自己的节日，把新中国视为非洲的希望”曼德拉这样对刘大使说。听着这些故事，我脑海里不由闪现出一幅朦胧的画面，一幅过去只在小说《红岩》中读过的画面，不由会想，这遥远的非洲大陆，过去几十年会与中国形成这样特殊紧密的关系，其中必有着十分丰富而特殊的时代内容。

到埃塞时，刘大使又说起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在此做外交官时，正碰上推翻门格斯图政权的内战，现任总理梅莱斯领导的埃革阵一路打回亚的斯亚贝巴。当时刘贵今作为临时代办留守使馆。占领首都的第二天，梅莱斯就约见了刘贵今。在刘大使看来，梅莱斯是一位极有智慧的领导人，他对刘贵今说，我们新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紧密友好关系，我们就是沿着你们中国人修的那条公路，开着坦克一路打到了亚的斯亚贝巴的。没几天，埃塞政府又邀请刘贵今在内的各国外交官，作为见证人，进老皇宫去见证将老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夫妇的遗骸从皇宫一间卫生间水泥地下面挖掘出来的过程。

这样带有私人记忆的当代中非交往故事，我还听到许多。

新中国对非外交，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开启的。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大陆，正在从西方殖民体系中解放出来，而中国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地探寻着属于自己的国际舞台。无论是非洲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甚或与被称为“狮子王”的埃塞老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交往，都是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几代中国外交官们在非洲广袤大地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的故事。几十年前，在非洲做外交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活之苦，战乱之危，酷热之熬，思乡之愁，点点滴滴，都深存于当事人心底。多年来，我曾造访过非洲内陆深处多个中国使馆、领馆，虽然现在条件大有改观，但当年之艰苦创业，依然可想而知，因而对新中国几代驻非外交官，我总怀有一份敬佩之情。他们中的许多人，年事已高，甚或仙逝而去，而健在的每每记起当年的经历，总是充满怀念的情感。他们的经历与记忆，他们的情感与思考，本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过去百年奋斗的一份精神遗产，自当留存下来，汇入民族国家的当代集体记忆与情感中。但是，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还很不够，目前出版的中国外交和中非关系的著述，往往多是一些概念性的框架或官方原则的宣示，缺乏历史的细节及个人的存在，这多少令人遗憾。

当代中非关系正在经历重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与日俱增。在此时刻，重温历史，当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与追求。历史既是人深藏于心的一种感怀往事思乡忆旧的情感，也是一种特殊的理性智慧与治国方略。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历史对于现实的垂训作用，早在文明之初就懂得了“史之为鉴”且“得可资，失亦可资”的道理，提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为取鉴以经世，疏通以知远，史学家们缘始察终，见盛观衰，以总结“人事”之得失来解释兴亡之运，盛衰之迹，从而“垂鉴戒、定褒贬”。历朝历代均汇集天下史才，记载先人事功，评价前人得失，所修之史典史册可谓如烟如海，湟湟泱泱。然而文献正史只是历史记述的一部分，它可能略去了太多的历史细节，隐去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个体生命与情感。因而通过历史经历者的口述来重现历史细节，复活历史的鲜活生命，却也是中华史学的传统之一。太史公司马迁著史百三十篇，以人物纪传体记事录言，故而两千年以下今人读来，感人之作多还是那些通过访谈记载下来的传记文字。

于是，我们设想，应该启动一个系统的精心安排的当代中非关系口述史项目，系统访谈中非双方的老大使、前政要，记言录事，传留后人。今天，史家可借用更先进之技术手段，借用专业之设备来系统访谈当事人，以勾勒岁月细节，复原历史全貌。不过，口述史学自有一套专业之规程与要求，所访对象，所谈话题，所录故事，皆需要按照口述史学之要求作专业安排与技术准备。虽然历史本身充满情感，而口述史学的私人记忆和个体讲述属性，又使其难免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与个人偏好，这就要求采访、记述、编辑、存档各个环节，都应努力遵循客观中立的原则，访谈过程和所提问题，旨在还原史实，客观实录，不可介入访谈者个人之好恶。访谈人对受访者之个人经历、时代背景、事件环境，也当周详准备，事先做好案头工作。访谈后对访谈结果作出专业性的分类、编辑、制作，形成可供阅读、视听的文字和影音材料，使其成为有史料价值和启示后人的口述史成果。如此，则既为中非关系史的研究，留下一笔宝贵的史料财富，也让当代国人的外交奋斗经历融汇到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记忆长河中去。